

二战后，帝国主义在亚非地区的殖民体系受到沉重打击，殖民势力得到很大削弱。与此同时，亚非地区民族独立意识迅速增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逐渐冲破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大约已有30个国家宣布独立，成为国际社会一股重要新兴力量。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与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之间渴望友好交往与合作发展的愿望，共同孕育了万隆会议（即亚非会议）发起和召开的土壤。万隆会议及其塑造的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有力促进了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了世界范围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让第三世界国家开始以独立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对世界历史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促进万隆会议取得成功

1954年12月，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国在印度尼西亚举行茂物会议，决定召开万隆会议，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亚非国家参加。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万隆会议在印度尼西亚顺利召开，最终有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约340名代表出席会议，中国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由获得民族独立的亚非国家举办、参加而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大型国际会议。尽管不是万隆会议的发起国和主办国，但是中国作为与会国之一，为万隆会议取得成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万隆会议的召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时，参加万隆会议的另外28个国家和地区中，仅有6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一些与会国在美国的唆使下蓄意挑起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争论，公开渲染共产主义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

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指出，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所以要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在万隆会议陷入分歧之时，正是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力挽狂澜，以求同存异的原则主动弥合分歧，才得以维系大会的团结，确保了大会的正确方向，推动大会发出亚非人民的正义呼声并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万隆会议的召开，正处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关键时期。1955年4月19日，中国代表团着眼当时亚非人民面临政治独立的紧迫任务，坚定支持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的斗争，明确提出“反对种族歧视、要求基本人权，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民族独立，坚决维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已经是觉醒了的亚非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要求”“争取完全独立是我们大多数亚非国家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目标”，坚定表达了中国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意志和决心，也由此赢得了亚非国家的信任和广泛赞誉。中国代表团与其他各国代表一道强烈谴责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最终对殖民主义问题达成了一致协议，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

参加万隆会议的亚非国家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侵略和压迫，极为珍惜

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明确表达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合作的强烈愿望。会上，周恩来总理抓住亚非国家追求独立、期待和平的共同愿望，不仅表达了中国对反帝反殖的坚定支持，还高举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倡导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成功消除了许多亚非国家对 中国外交方针的疑虑，塑造了新中国反对战争、捍卫和平的形象，推动会议达成了处理相互关系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1955年4月24日，万隆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在内的关于各国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被写进公报，并成为其第七部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的基本内容。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集中表达了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完全解放，要求亚非各国友好、团结、合作，以及为维护世界和平而进行斗争的精神。这是亚非国家携手塑造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努力，对于推动当代国际秩序发展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万隆会议的历史影响

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觉醒，向世界宣告亚非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支重要新生力量已经登上国际舞台，向世界展现了它们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所作的重

大努力。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极大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其一，促进民族解放运动实现最终胜利。万隆会议的召开极大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从1955年至1969年，亚非地区的独立国家由29个增至73个。特别是在非洲，仅1960年就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被称为“非洲年”。数十个亚非国家相继获得政治独立，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有力终结了西方殖民者几百年来建立的殖民体系，极大改变了亚非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传统关系，极大改变了长期以来不平等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一大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走向独立，这是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最为重要也最富历史意义的变化之一。

其二，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觉醒。20世纪兴起的亚非民族觉醒必然要求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也迫切希望在国际上获得亚非人民应有的国际尊重和平等地位。长期受压迫受奴役的亚非人民，第一次以独立姿态屹立于世界，第一次共同发出了震撼世界的声音。拉丁美洲也深受万隆精神的感染，部分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也掀起了反美反帝群众运动和游击战争，由此出现了遍及亚非拉世界的广泛的民族觉醒浪潮。在第三世界国家走上世界舞台并展现它们强大力量的进程中，万隆会议和万隆精神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其三，为不结盟运动的诞生奠基。万隆会议表达了鲜明的中立立场和坚定的反战色彩，为不结盟运动的

诞生奠定了基础。1956年7月，即万隆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南斯拉夫举行会晤，一致明确反对把世界分裂为彼此对立的国家集团，提出了著名的“不结盟”主张。1961年9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召开了首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25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不结盟运动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64年在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七十七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七十七国联合宣言》，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七十七国集团正式形成。从万隆会议起步，到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亚非拉国家通过自己的力量团结在一起，第三世界国家逐步成为一支不依附于任何大国集团的独立政治力量。

其四，开启了南南合作的历史进程。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携手追求联合自强和自力更生，催生了南南合作的正式起步。当时最紧迫的历史任务，自然是共同反帝反殖，共同追求亚非国家的完全独立和解放，同时还要推动亚非国家开展经济合作，从根本上奠定自立自强的基础。以团结合作实现联合自强，以互帮互助实现自力更生，正是南南合作与生俱来的精神实质。

万隆精神的时代价值

作为万隆会议最主要的精神遗产，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在当前“全球南方”快速崛起但单边主

汉朝的西南边疆治理

□ 李竞恒

西汉以来，中原王朝已经开始对我国西南边疆地区进行治理。公元前109年，汉朝在云南滇池地区，正式建立起益州郡，开始了对西南边疆云南的治理。2021年以来，在云南河泊所遗址中，出土了数万枚简牍，其中2000多片写有文字，为益州郡及滇池县官署的相关遗存。目前公布的遗存信息，已经显现出汉代中原王朝对当地的多领域治理、中原文化对于当地的深刻影响。

河泊所简牍材料显示，当时汉朝在益州郡已经建立起和内地郡县一样的编户齐民制度，以及各级社会基层组织。河泊所出土的大量基层户籍档案，格式与内地出土汉代户籍简牍完全相同，如一枚户籍简牍记载：“铜奉宗宁□里户人伍奉年卅五算一卒贫”，清晰记录了一名益州郡编户民众的基本情况。他的年龄是45岁，身份是“士伍”，户口信息登记为某县、某乡以下的“宁□里”，类似于现代的某村。这也表明，汉朝在边疆的益州郡，已经和内地一样，建立起郡、

县、乡、里的行政序列与基层组织，并对基层编户民众有清晰的户籍登记。这种治理水平，远远超越了此前古滇国时期以民族血缘为组带的原始松散的治理结构。

河泊所简牍中有记载，益州郡建伶县有“髡鉗吴屯代杨阎”。“髡鉗”是一种刑罚，要剃掉头发和胡子。吴屯、杨阎都是内地人的名字，即吴屯代替杨阎，前往益州郡服役或作为新移民。秦代以来，中央政权就通过将内地罪犯等移民到巴蜀，以实现开拓巴蜀、治理巴蜀的目标。河泊所简牍表明，汉朝继承了秦代的这一政策，并将其继续向西南边陲地区的益州郡进行拓展，以强化对西南边疆的管控。

除了对编户管理的乡、里基层组织外，河泊所简牍也反映出汉朝在益州郡建有亭、邮的治安、文书信息传递系统。亭是在不同乡之间的治安管理机构，秦汉时大概在十里之间就设立一个亭，刘邦就曾担任过泗水亭长。亭长下设有“发弩”“求盗”“亭佐”“亭卒”等下属吏卒，负责帮助维持治安，并配合“邮”的信息传递渠道。河泊所H18出土简牍中有“滇池以亭行”的文字，表明益州郡下属滇池县，建立有亭、邮的治安、信息系统。在内地出土简牍中，“××以邮行”是一种常见的文书格式，“滇池以亭行”即是将密封的文书等材料，从基层通过亭传递到滇池县。汉代政府通过文书的传递，可以有效沟通基层乡、里与县、郡级政府之间的信息，保持对基层的有效治理。此外，通过亭、邮所构建的交通、信息系统，益州郡与内地，尤其是经营西南夷的前沿巴蜀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目前公布所见河泊所H18简牍中，记载了巴郡江州、成都、广汉郡、梓潼等巴蜀地区与益州郡之间的文书、信件往来，其中一些还记载了蜀地车队和物资向益州郡的运输。河泊所H18出土的书信简牍，是一个外地叫“富劓”的人，写给益州郡当地青、平、子林、文先、少□这五人的信件。这封书信的文化面貌与内地信件的格式、用语也完全相同。五位作为汉官吏的收信人，可能也来自中原内地，显现出当时文化面貌上的统一。这些都表明，汉朝以巴蜀地区为开拓、经营西南地区的腹地，通过巴蜀和中原

内地，源源不断地将人员、资源向云南益州郡等更遥远的西南边疆地区进行输送。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行政、文书、邮政、信件等之外，汉朝还在益州郡当地推行中原教育，传播中原文化。在河泊所就出土了《论语》的简牍，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普及性读物，是中原文化在边疆地区教育传播的重要内容。汉朝西北边疆的居延、东北边疆的乐浪等地，都曾有《论语》简牍的出土发现。在昆明河泊所出土残简中，有“季氏旅于”和“能救与对曰不”两段内容，即出自《论语·八佾》：“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这条内容的意思是，鲁国的执政大贵族季康子，要到泰山去祭祀，叫“旅于泰山”。“旅”在西周金文中，指可以挪动和移动的器物，携带很多旅器去祭泰山，是周王、鲁国国君才有的资格。季康子作为鲁君之臣，是一个“陪臣”，并没有资格携带旅器去祭祀泰山。孔子弟子冉有，当时是季氏的家臣，于是孔子就向他询问说，你是否能阻止季康子旅祭泰山这种违背礼制的行为？冉有遗憾地表示，我没有这种能力。

《论语》中这一条内容，很生动地展现了孔子试图挽救“礼崩乐坏”的这一文化背景。在遥远的云南河泊所遗址中出土这条《论语》简牍材料，表明随着汉代时期中原文化、教育在西南边疆的传播与推广，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原文教，在西南边疆的土地上开始落地生根。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汉章帝时蜀人王追担任益州郡太守，在行政与教化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在当地开始建立学校，推行中原的风俗文教。他在边疆地区治理取得美政，也迎来了“甘露降，白鸟见”的祥瑞。

汉代从董仲舒以来，便从《公羊传》中提炼并弘扬“大一统”的思想。在这一背景下，汉朝对各地的边疆治理，都采取了积极有为的政策。云南河泊所遗址新发现的汉代简牍，以真实生动的文字材料展现了汉朝在西南边疆从行政、职官、司法、交通到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一系列可观的治理成就。



从考古看文明